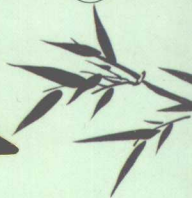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余秋雨

精品集

(一)

崔春昌◎主编
余秋雨◎著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余秋雨

精品集

(一)

崔春昌◎主编
余秋雨◎著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精品集(一)/余秋雨 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
(2009.1重印)

晨光文丛(春秋行丛书)崔春昌 主编

ISBN 978-7-5317-1755-3

I. 余... II. 余... III.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0601号

著 者 余秋雨

责任编辑 许 声

责任校对 李 宏

出 版 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105栋1号)

发 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60

字 数 4000千字

印 次 2009年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17-1755-3

总 定 价 371.80元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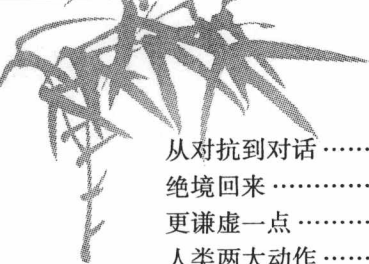
《春秋行丛书》的出版，旨在囊括世纪华人文学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套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本丛书凝聚了十二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春秋行丛书》将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本丛书共收录十二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余秋雨、钱钟书、鲁迅、林语堂、三毛、张爱玲、徐志摩、朱自清、茅盾、冰心、刘墉、丁玲等。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曾经流传下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编撰本丛书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收获。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愿本丛书能够成为读书人书架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目 录

霜冷长河

壮士	1
中秋	2
琉璃	4
垂钓	5
老师	6
长者	9
关于友情	19
关于嫉妒	27
关于善良	34
关于年龄	42
最后的课程	52
与生活讲和	54
绑匪的纸条	58
智能的梦魇	60
文化敏感带	61
这样的男人	64
大桥的寓言	67
遗憾的真实	68
氢弹的部件	69
乱世流浪女	71
褪色的疑问	73
心中的恶狼	75
为自己减刑	78
灯下回信	79
我的意见是——	95
掩卷沉思	95
藤葛飘飘	96
收藏昨天	97
游戏还是战斗	99
现代阐释	100
倾听祖先	101



从对抗到对话	102
绝境回来	104
更谦虚一点	104
人类两大动作	105
中国人	106
明天的功课	107
文化陌生人	107
世纪之辩	108
秋千架(代后记)	109

借我一生

旧屋与旗袍(1)	115
旧屋与旗袍(2)	119
昌世文章醒来求	125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126
冬天的斯坦尼	142
自我清查	168
墓地和法院	185
借住何处	200

山居笔记

一、说来话长	204
二、深夜电话	205
三、北京友人	206
四、搏斗的印痕	208
一个王朝的背影	209
流放者的土地	218
苏东坡突围	228
千年庭院	235
抱愧山西	245
乡关何处	256
十万进士	267
遥远的绝响	276
小人	288
长者	299
关于友情	308





霜冷长河

壮士

罗布泊一场铺天盖地的沙暴终于过去了,余纯顺准备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他立即领悟,时间到了。那好,脱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确认一下方向,面对东方,面对上海,靠着灼热的沙丘,躺下。

时间到了。时间果真到了?

自从八年前开始走上探险之路,他已无数次地想象过死亡,但从来没有想象到死亡来得那么快,毫无先兆,毫无预告。什么也来不及想了,只觉得一团热浪翻卷几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最后睁开一下眼睛,眯缝着看着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都看见了。远处是自己无数的脚印,而远处的远处,则隐隐约约是黄浦江畔外滩的剪影。一个月前顺便回去了一次,去与故乡告别,现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匆匆来去时与一群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于是,我选择了孤独,选择了行走。我已走了八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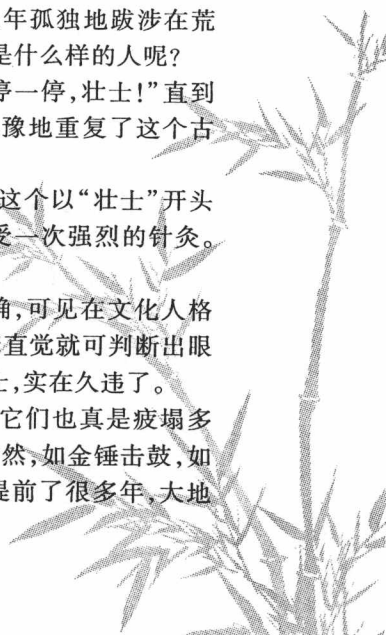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录音机里掌声阵阵,我想,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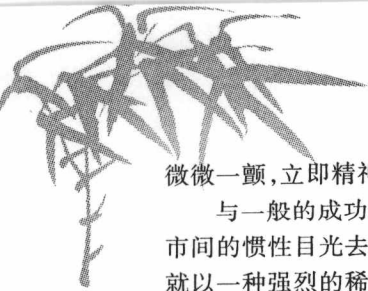
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





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道地,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

中秋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报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风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

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帶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知道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它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它场所与他无缘。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别处寻找,她们只会去了太空。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月亮也从浊黄变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虫长叫一声,像个秋天了。



琉璃

春秋行丛书

一条用黑色的木板砌成的长长甬道，里里外外全是竹子，杨惠珊女士和张毅先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和我见面，我一进去就觉得飘飘浮浮，神秘得不知身在何处。

他们慢悠悠地告诉我有关琉璃世界的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点不可思议。终于说到，有一次，他们得到一件汉代琉璃，小心翼翼地拂拭掉蒙封千年的泥垢，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端详，突然，轻轻的喀哒一声，它断裂了。“为什么两千多年都安然无恙，偏偏就在这一刻断裂呢？”他们问得若有所思。

我说，它已等得太久太久，两千多年都在等待两个能够真正懂得它的人出现，然后死在他们手上，死得粉身碎骨。

我这么说，并非幽默。琉璃当然是有生命的，要不然为什么会吸引两位艺术家耗费自己的整个生命去悉心侍候？既然有生命，就必然等待知音、准备死亡，死亡在知音面前。科学家也许会说，它的破碎是因为出现了共振，那么，共振来自何方？来自两位艺术家急剧的心跳、紧张的呼吸，而这，正是知音的征兆。

在我们作这番谈话的时候，我的司机神情本然，一直定睛看着杨惠珊，最后忍不住悄悄地问我：“这位女士怎么这样眼熟？”我轻声回答：“整个亚洲都认识她，主演过一百多部电影，金马奖影后、亚太影展影后。”他吃惊了：“真是杨惠珊？”我平静地点头。

杨惠珊刻骨铭心地演尽了人世百态，突然受到另一个世界的感召。她向亿万双期待着她的眼睛挥挥手，飘然远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一点别的东西。终于，她发现了琉璃世界的灵光闪烁。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她早已习惯于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创造的材质，但是，人类的身体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材质吗？未必。为什么上天让她又看到了另一种材质，可以吸纳华彩却又纯净透明，可以美艳惊世却又霎时自灭，可以化身万象却又亘古安静？这比用人体表演人体，更空灵、更高贵、更诗化。

她在这种材质前站定，不会言动。她对张毅先生说，你坐一会儿，喝杯咖啡，我还要看。张毅先生说，好，你看吧。他知道，那儿要发生大事情。

既然看到，就放不下了。她远涉重洋，多方拜师，尽倾资财，遍尝磨难，只想用自己的手去触摸、去塑造、去捧持。一度，她身边堆满了烧坏了的废品，废品由财富转换而来，财富由生命转换而来，种种转换全成了废品，种种废品连成了废墟。

在失败得毫无希望的废墟上，她不茶不饭，静守静思，决不离去，直到奇迹终于出现。青烟散去，炉门打开，慢慢冷却，细细逼视，哦，成了。她的作品很快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极大注意，这没有使她过于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她听一位日本学者随意提起：这种工艺在中国汉代之前就已经成熟。真的吗？杨惠珊急速转过身来，迷惑地眺望起遥远的黄河流域。

原来还以为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呢，居然在异国他乡拾到了一部依稀的家谱，找到了自己远年血缘的印证。这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地对琉璃世界如痴如狂？为什么以前毫无雕塑经历和冶炼经历只凭自己的摸索便取得奇巧配方？也许是接收到了几千年前发出的秘密指令？几千年都是失传的荒原，荒原那边是影影绰绰不知名的伟大

工匠，荒原这边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当代女子。

两边的窑炉烈火熊熊，像两座隔着千山万水的烽火台，烽火台传递的信号却准确无误。其它多少座烽火台都与战争有关，唯有这两座不是，隔着三国的血腥、隋唐的搏斗、宋元明清的厮杀，却只有两缕最干净的轻烟，遥相呼应。

此时的杨惠珊，已跻身数量极少的国际第一流琉璃工艺大师的行列。一次又一次轰动的展出，一浪又一浪如沸的佳评，杨惠珊神定气闲，只向主办者提出一个请求，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边上，让出展览厅的中心部位，以最虔诚的方式将远处的烽火台——汉代的琉璃陈列其间。展览厅一时烘云托月，她把全部荣誉献给了祖先，只想与祖先共享一个名称：中国琉璃，然后相扶相持传播给今天的世界。

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佛教中，琉璃的地位非常特殊。那天杨惠珊突然读到《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时并没有太大吃惊，因为她觉得本来就该如此。经文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果然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

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用火烧，更用心烧，于是，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这两重窑变的成果，是人类真正的珍宝。于是，当冲天的烟雾飘散之后，有一双纤纤素手在仔细拾捡。

她无法删去历史和自身的坎坷和辛酸，只是深知既然经历了那么多，我的这一炉应该不同于汉代的那一炉，我的这一炉烧进了更多的历史灾难，理应用现代语言把它们升腾为更大的仁爱 and 慈悲。

金手指天，诸佛列位，宏愿庄严，杨惠珊的琉璃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奇瑰的精神仪式，很让国际同行震撼。这种冰清玉洁的仪式，这种纯净明澈的震撼，出现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其力量早已远远超出案头摆设之外。

杨惠珊今后的计划如何？她不企盼明确的远景，只愿意在琉璃世界中专注修持，享受挫折，直至化作泥土，来肥沃历史和现实的荒原。张毅先生告诉我：“就在昨天，一宗大件出炉，一个小小的瑕疵，失败了，今天重新开炉，又要二十五天。”杨惠珊说：“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听到一点极细的响声就会心跳，因为这是断裂的警报。琉璃都会断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就像那件汉代琉璃断裂在她的手上那样，她的作品也会在后代手上断裂，那么，想必也会有人手捧美丽的断片蓦然憬悟的吧！

垂钓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

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老师

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记得第一节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

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眼神。

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在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外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 Essential English 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

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羨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

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的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长者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

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

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到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

“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

“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

“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

“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合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平生又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她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傻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